

北京专史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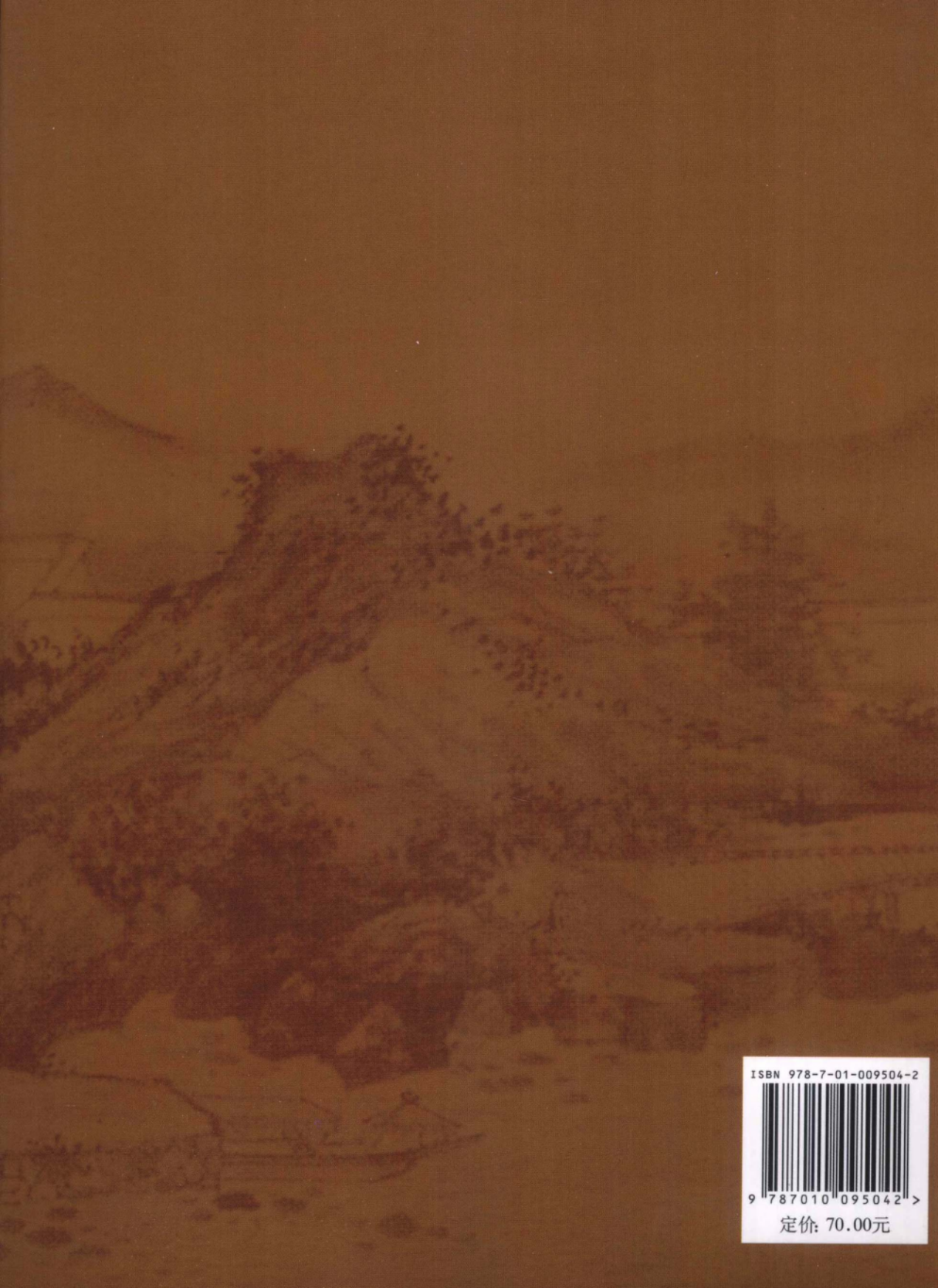
主编 王岗

# 北京宗教史

本书主编 郑永华

 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01-009504-2



9 787010 095042 >

定价: 70.00元

北京专史集成

主编 王岗

# 北京宗教史

本书主编 郑永华

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宗教史 / 王岗主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北京专史集成)  
ISBN 978-7-01-009504-2

I. ①北… II. ①王… III. ①宗教史—北京市  
IV.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9293 号

## 北京宗教史

BEIJING ZONGJIAOSHI

---

丛书主编: 王 岗  
本书主编: 郑永华  
出版策划: 张秀平  
责任编辑: 关 宏  
装帧设计: 曹 春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 peoplepress. 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9504-2  
定 价: 70.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 《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组成员

总顾问：刘牧雨

总策划：戚本超

主 编：王 岗

特聘学术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王钟翰、陈高华、林甘泉、赵其昌、徐莘芳、曹子西、龚书铎、蔡美彪、戴 逸

名誉顾问：陈之昌

执行策划：王 岗、李宝臣、刘仲华、章永俊

编委会主任：李宝臣

编 委：王 玲、尹钧科、阎崇年、王灿炽、吴建雍、于德源、李宝臣、孙冬虎、袁 熹、王 岗、吴文涛、郑永华

分卷主编：（见各卷）

课题组成员：王 岗、尹钧科、吴建雍、于德源、李宝臣、袁 熹、邓亦兵、孙冬虎、吴文涛、何 力、郑永华、刘仲华、张雅晶、赵雅丽、章永俊、何岩巍、许 辉、张艳丽、董 焱、王建伟

课题组特邀成员：张 泉、齐大芝、赵志强、徐丹佺、李建平、韩 朴、谭烈飞、马建农、姚 安、邓瑞全、郝志群、宋卫忠等

**本书主编：郑永华**

**本书撰稿人员（以姓氏笔划排序）：王 岗、张艳丽、  
何岩巍、郑永华、赵雅丽**

# 序

北京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30年来，在全所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一些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其中，又以曹子西先生主编的《北京通史》为代表，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而《北京通史》的问世，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2006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加大扶持力度，提出把《北京专史集成》列入院科研重大课题，使得我院的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从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历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始对北京专史进行研究，如王玲女士撰写有《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尹钧科先生撰写有《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于德源先生撰写有《北京农业经济史》，吴建雍等人合写有《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城市发展史》，等等，这些专史的问世把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但是，要想形成一套体系完备的专史研究系列，显然仅仅依靠个人的研究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组成一支力量相对强大的科研队伍，才能够完成系列专史研究的繁重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领导组织历史研究所的全体科研人员对《北京专史集成》课题进行了认真的论证。特别是课题总顾问刘牧雨院长和课题总策划戚本超副院长对课题中研究项目的编写原则和立项次序都给予了精心指导。经过论证，初步确定了《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的第一批研究项目，即：



1. 北京政治史；
2. 北京经济史；
3. 北京农业史；
4. 北京手工业史；
5. 北京商业史；
6. 北京军事史；
7. 北京文化史；
8. 北京文学史；
9. 北京美术史；
10. 北京学术史；
11. 北京著述史；
12. 北京戏剧史；
13. 北京风俗史；
14. 北京考古史；
15. 北京民族史；
16. 北京宗教史；
17. 北京佛教史；
18. 北京道教史；
19. 北京伊斯兰教史；
20. 北京基督教史；
21. 北京教育史；
22. 北京城市发展史；
23. 北京建筑史
24. 北京园林史；
25. 北京陵寝史；
26. 北京地理学史；
27. 北京交通史；
28. 北京城市生活史；
29. 北京建置沿革史；
30. 北京对外交流史；
31. 北京水利史；
32. 北京饮食史；
33. 北京服饰史；
34. 北京环境变迁史；
35. 北京音乐史；
36. 北京名胜史。

这些研究项目，只是北京专史庞大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今后随着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专史的项目也会不断增加。《北京专史集成》经过历史研究所论证之后，院领导又组织全院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重大课题进一步加以论证，并且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对专史的撰写工作有很大帮助。

《北京专史集成》中的每部专史的容量，视其内容的多少，大致在30万字左右，有些内容较多的，字数可以多一些，反之，则会少一些。各部专史的时间跨度，一般始于远古，迄于新中国建立。有些部专史在撰写过程中，时间会有所下延。如《北京建置沿革史》，必须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能够对今天北京政区的沿革状况有全面的叙述。各部专史的地域范围，也不是严格局限在今天的北京政区，而是根据不同朝代政区划分的变化而随之变化，如汉唐时期的幽州，辽代的南京析津府，金代的中都大兴府，元代的大都路，明清时期的北京顺天府，等等。政区范围的大小虽然会不断变化，但是其核心地区仍然是今天的北京。

《北京专史集成》的撰写，有很多难以处理的地方。例如，“专”和“史”的关系。“专”是指专门、专业，如在《北京宗教

史》中，“专”是指宗教或是宗教学，而“史”则是指在北京历史上曾经发生或是出现过的、与宗教有关系的事件或人物，当然也包括相关的典制。如在《北京宗教史》中，我们所研究的佛教史，主要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在北京地区的禅宗、律宗、净土宗等佛教流派的发展、变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这些佛教流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其代表人物的社会活动、历代统治者和社会各界对这些宗教派别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重要宗教事件，等等。我们认为，要想处理好“专”与“史”的关系，一方面，要掌握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又要对当时的历史状况有准确的认识，掌握宗教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认识不同历史时期宗教产生、发展和兴衰的变化历程。其他专史的撰写工作也是如此。

再如，“全国”和“地方”的关系，换言之，即“全局”和“区域”的关系。在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所有的北京史都是“地方史”，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有着明显的“区域”性质。但是，当北京成为全国首都之后，在北京发生的许多史事除了具有“地方”和“区域”的性质之外，又具有了“全国”或是“全局”影响的特质。如“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力之持久，显然不是局限在北京地区的。此外，由于北京的统治中心地位，有些发生在其他区域（甚至国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会对北京产生巨大的影响。如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这些重大事件的始发地虽都不在北京，但其对北京的巨大影响甚至超过了在北京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因此，如何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在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确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

《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立项后，得到了学术界和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首先，是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著名史学前辈在年事很高、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热情支持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慨然担任特聘学术顾问，并且对北京专史的撰写工作提出了珍贵的指导意见；有些史学前辈还在百忙之中审阅了部分书稿的内容。其次，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陈之昌主任和李建平副主任对本课题的重视，使《北京专史集成》得以被列为市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再次，本课题的出版工作得到了人民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出版经费较少的情况下，得以立项出版。特别是资深历史学编审张秀平女士和诸多编辑人员，认真审阅全部书稿，并且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

意见，为各部专史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批批老专家学者们为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他们的退休对北京文史研究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是，许多已经退休的老专家仍然坚持工作在科研第一线，笔耕不辍。《北京专史集成》中的一些项目就是以他们作为骨干带领年轻同志完成的。一批批青年学子陆续来到所里，他们在科研能力上尚需锻炼，在学术见识上亟待积累，但是，他们有朝气，有吃苦耐劳的干劲，有新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假以时日，他们在《北京专史集成》研究中的成果将会越来越多。我相信，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热心帮助下，在历史研究所全体新、老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持之以恒，《北京专史集成》将会为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不断增添新的科研成果，为首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不断做出新贡献。

值此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建院 30 周年、《北京专史集成》开始出版之际，是为之序。

王岗

2008 年 10 月

# 前 言

在当代人们的生活中，宗教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既神秘又普通的事物。不论你走到哪里，繁华的都会、偏僻的小镇，还是深山老林之中，都会发现有一些宗教建筑。透过这些宗教建筑，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人们宗教信仰的变化，不同民族民众宗教文化的特色，以及超越时代、超越种族的全人类的神圣情感，等等。迄今为止，在遍布世界的各个国家、城市、乡镇，还很少见到没有宗教建筑的地方。由此即可看出，从古到今宗教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古代，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历程。首先，是政治权力对宗教神权有着强大的支配力量。在先秦时期，天子的权力至高无上，秦汉以后，皇权则具有支配一切的力量。其次，是伦理道德与宗教信仰在社会上都有着巨大的作用，有时宗教的发展还要借助伦理道德的影响。再次，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强大力量对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多种宗教并存局面的形成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形成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政治框架，作为这套集权框架基础的是宗法制和分封制。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更是把这套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推向了极致，除了宗法制和分封制之外，又增加了郡县制。在如此严密的政治框架控制之下，宗教要想得到发展，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代价之一，就是对以皇权为标志的政治权力的妥协，承认政治权力对宗教神权的控制。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多种宗教并存的社会中，每个宗教派别都希望得到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的认同与支持，才能够在与其它宗教派别的斗争中占

据优势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多次大规模宗教冲突中，哪种宗教派别得到政府的支持，哪种宗教就会在冲突中获胜。

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家庭和亲情的民族，因此，也就特别重视维系家庭关系的伦理道德观念。“孝”道不仅在家庭中，而且在社会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有的封建统治者竟然提出要以“孝”道治理天下，由此亦可看出伦理道德观念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是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不论是本土产生的宗教（如道教），还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如果其教义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它在社会上的传播必然会受到极大影响。佛教在初入中国之时，因其教义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观念发生冲突，故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排斥，直到其教义中融入了中国的伦理观念，换言之，在其宗教教义向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妥协之后，才得到更多人们的崇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是一个层次极高的哲学理念，得到绝大多数中国百姓的认同。这个理念在宗教方面的反映，就是多种宗教派别的并存。例如，广大百姓在崇奉佛教的同时，并不排斥道教等其他宗教派别的活动，甚至有些百姓同时崇奉多个宗教派别。对于这种中国所特有的宗教现象，许多西方学者无法理解，甚至得出了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徒的结论。显然，用西方文化理念来观察中国的文化现象，难免会有偏颇之处。对于中国人的宗教观念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如何评价，必须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大的社会背景，如果离开了这个大的社会背景，认识和评价也就难免有偏颇之处。外来宗教向中国传统文化妥协，是其在社会上得到广泛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北京地区，早在北京猿人生活的遗迹之中，有关的考古专家就曾发现有过原始宗教的痕迹。而作为比较成熟的宗教，其产生和传入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本土产生的宗教是道教，东汉末年的燕赵地区农民大起义就是借助了道教的力量。而到了晋代初年（有些文献记载是在汉代），从外地传入燕地的佛教也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北京地区活跃的仍然是佛教与道教。直到辽金元时期，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才陆续传入北京地区。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各种宗教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应该是各宗教派别有了很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辽金元时期，乃是北京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在政治上，这里经历了从割据政权陪都变为割据政权首都、再变为全国

一统王朝首都的历程，使北京地区的政治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随着北京政治地位的提高，其在宗教界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任何一个宗教派别要想扩大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必须要在统治中心开展活动，因此，从辽代开始，北京地区的宗教活动场所就在不断增加，一直到清代，达到了巅峰状态。而各个宗教派别的著名领袖人物，也汇集到京城来，围绕在封建统治者周围，开展各种宗教活动。宗教场所的不断增长，宗教领袖人物的频繁活动，使得北京逐渐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宗教活动中心。

明清时期，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是封建统治者对各种宗教派别的活动加以控制，管理得越来越严密。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派别的发展带有了越来越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点，我们通过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与封建帝王的关系即可看出。在元代，每当新的帝王在即位之前，都要请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帝师为其受戒。帝王即位之后，还要派一位少年出家为僧，作为自己的替身。到了明代，帝王即位之后虽然还要找一位出家的替身，却把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帝师身份取消了，即位时也不再请他们受戒了。而到了清代，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虽然与元代一样，都是封建统治者巩固边疆统治的重要助手，但是，达赖和班禅的相互制约与活佛转世制度都变成了政治权术，使清朝政府能够更加有效地控制藏传佛教的势力。

清末民初的北京，是传统宗教派别，如佛教和道教趋于衰落的时期，其活动场所（如寺庙和道观）往往被社会各界占用兴办学校，有些宗教建筑则因缺乏经费修缮而破败不堪了，还有些寺产被典卖而变成了民居。与此同时，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日甚一日，西方的宗教势力，如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也在逐渐扩大其对社会各界的影响，成为许多社会名流崇奉的对象。但是，西方人种与中国人种的差异，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隔阂，以及西方宗教所具有的强烈排他性，都对西方宗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天主教和基督教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开展活动，而没能像本土的宗教道教和已经“汉化”的佛教那样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也是一种宗教，被称之为儒教。在历史上，其开山鼻祖孔子被封为神，建有庙、塑有像，岁时举行祭祀典礼，甚至还有自己的经典与教条，和佛教、道教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如果说，天下的僧人都是佛教的信徒，天下的道士都是道教的信徒，那么，天下的儒生就都是儒教的信徒。这

就牵扯到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其一，宗教信仰与宗教仪式哪个更重要？其二，信仰的宗教性与非宗教性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其三，宗教偶像的人化与非人化和人的偶像化有何本质区别？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许多人都会认为宗教信仰比宗教仪式更重要，因为信仰是核心，仪式是表象。但是，我们会问，如果宗教活动没有仪式行吗？我们又会问，每个僧人和道士（或者说是所有的宗教徒众）都有纯粹的宗教信仰吗？答案是什么？谁能够解释清楚这些问题，谁又能够理解我们提问的目的到底何在呢？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民间神灵的崇拜与祭祀是普遍存在的，其活动场所主要是坛庙与祠祀，如天坛、地坛、社稷坛，关公庙、财神庙、城隍庙，等等。通过坛庙活动，人们祈求各种神祇带来好运，避免灾祸。在这一点上，是与其进入寺院、道观的祈求行为完全一致的。祈求的结果“灵”与“不灵”，也就是说神祇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是很难印证的，但是，大多数人们却往往会认同“灵”的结果，而不去追究“不灵”的结果，遂导致有些神祇的威望变得越来越高，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形成的崇拜信仰越来越普遍。

对有些神祇而言，众多百姓是十分敬畏的，却没有权力加以祭祀，如对于天神地祇而言，只有封建帝王才有权力举行祭祀仪式。即使他不亲自主持仪式，也要委派手下重要大臣代行祭祀天地的活动，不得有丝毫的马虎。对于这种神祇的祭祀，包含着帝王与普天之下千百万民众的共同利益，因为天神如果带来“风调雨顺”，百姓有了好的农业收成，不仅自己的生活得到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得到保障。但是，祭祀天神的权力却只能由帝王来行使。

由此不难看出，人们通过民间信仰所祭祀的神祇，与其日常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真实反映出人们迫切的生活需求。凡是个人能力所无法解决的生活需求，就会通过对相关神灵的祈祷来获得精神上的支持。某一社会阶层人们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祈求共同的神灵，于是就产生了行业神祇的崇拜。因此，民间信仰所反映出来的宗教因素，乃是人们现实生活最生动的写照。我们在研究北京宗教史时，这一部分内容是应该给予足够重视的。

人们在研究宗教历史文化的时候，难免要涉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许多人都认为，宗教的产生与科学的不发达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人们对天神的崇拜，是与其对宇宙的无知联系在一起。又如人们对今生与来世的认识，则是与其对精神、物质的构成



无知联系在一起。但是，历史发展到了21世纪的今天，科学有了极大的进步，宗教却并没有因此而衰落甚至消亡，依然十分活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如何认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宗教与科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科学的发展可以使人们更加客观地认识世界，但是，宗教信仰本身不是科学，因此，宗教问题也就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解决。宗教属于文化的范畴，宗教信仰问题只能用文化的发展加以解决。

王岗

记于2010年8月

# 目 录

序 .....	王 岗 (1)
前 言 .....	王 岗 (1)
概 述 .....	(1)

## 第一篇 北京佛教史

<b>第一章 唐代及唐代以前幽州的佛教 .....</b>	<b>(19)</b>
第一节 汉唐统治者的宗教倾向、宗教政策及其影响 .....	(20)
第二节 燕地佛教的始兴 .....	(21)
第三节 燕地僧侣的活动 .....	(24)
第四节 燕地初建的寺庙 .....	(28)
<b>第二章 五代及辽代燕京地区的佛教 .....</b>	<b>(32)</b>
第一节 契丹贵族的宗教观念及其崇佛活动 .....	(33)
第二节 燕京寺院的增加 .....	(35)
第三节 燕京的佛教派别及高僧的活动 .....	(37)
<b>第三章 金代中都地区的佛教 .....</b>	<b>(44)</b>
第一节 女真统治者的宗教观念及其政策影响 .....	(44)
第二节 主要佛教宗派的发展变化及著名僧侣的活动 .....	(46)
第三节 中都寺庙的进一步增建 .....	(51)
第四节 佛教典籍的整理与刊刻 .....	(53)